

【论 文】

“东突”的“三位先生”与国民政府¹

潘志平²

“东突厥斯坦”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的民族分裂运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其中，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以下分别简称：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代表着投靠国民政府的反苏反共政治集团，曾长期文说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从事分裂活动，1945年随着国民党势力返回新疆，还曾被国民政府委以新疆省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要职。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曾撰文谴责：“三位先生和他们的集团”是“帝国主义间谍”。³阿合买提江在此虽未点出这“三位先生”大名，但那个时代新疆政坛上，所谓的“三位先生”指的就是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人。兹有艾沙的土耳其文本的《自述》为证，即他对麦斯武德说的一段话：

我们以‘三位先生’（*Üç Efendi*）著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主义者都非常尊重您、伊敏先生和我。⁴

本文将充分使用这份《自述》。其《自述》是 M. Ali Taşçı 根据艾沙晚年口述录音译成土耳其语，其中不乏有艾沙的自吹自擂成份，也有时间记忆不清和史实讲述混乱的问题，但艾沙自始至终地参与了 this 政治集团与国民政府交往的全过程，应是最重要的当事人，故此其《自述》还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关于国民政府 1930 至 1940 年代的新疆政策，特别是应对“三区革命”的行动策略，已有较多研究⁵，而国民政府与这一的政治集团的关系，除了 Wu, Aitchan K. (吴蔼宸) 和 A. D. W. Forbes⁶ 的较粗线条的描述外，琳达·本森 (Linda Benson) 的论文《1940 年代的维吾尔政治家：伊敏、艾沙和麦斯武德》⁷ 是比较重要的专题研究论文⁸。本文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¹ 本文刊载于《史学集刊》2016 年第 5 期。

² 作者为 新疆大学 中亚研究院 教授。

³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7 页。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Derleyen M. Ali Taşçı. İstanbul: 1985. (以下简称: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81.

⁵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新疆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厉声：《中国新疆 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之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年；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有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问题，如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⁶ Wu, Aitcha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Longdon: Methuen. 1950;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0);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⁷ Linda Benson: *Uygur Politicians of 1940s: Mehmet Emin Buğra, İsa Yusuf Alptekina nd Mesut Sabir*.

一、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位先生”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三位先生”结成一个铁帮派，但出身的文化背景还大不相同。

麦斯武德

全名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虽在“三位先生”中年最长，政治地位最高，也是当时维吾尔人中最大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对他的早年经历却了解得较少。目前，唯有他们出版的《阿勒泰月刊》一期中“新疆名人介绍”有粗线条的比较可靠的记载：1887年生于伊犁，其祖阿图什富商玉山巴依因生意上的缘故，曾遍游巴黎、柏林、莫斯科、伊斯坦布尔等地，因为受宗教的影响，他对伊斯坦布尔有浓厚的感情。这种影响后来一直主导着麦斯武德的人生。麦斯武德1904年赴土耳其求学，先后在哈美的耶学院和伊斯兰堡医学院大学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学科的学位¹。麦斯武德土耳其求学期间接受了泛突厥思想，并憎恶与奥斯曼土耳其为敌的俄国，更加敌视苏联“十月革命”奉行的共产主义。麦斯武德1919年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回国，在伊犁办医院，还出资创办了“土兰”、“德尔乃克”、“东迈亥莱”等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全部用土耳其文授课，四所“德尔乃克”（讲习班之类的非正式学校），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即鞑靼斯坦和土耳其“扎吉德”运动²在新疆的延续。杨增新认为麦斯武德所办学校对地方社会稳定危害甚大，从而对其一一查禁，并曾将其下狱关押十个月。1933年，新疆处于大动乱之中，麦斯武德投奔地方军阀麻木提师长（Mahmut Muhiti，1887-1944），充当其政治顾问。关于麻木提师长这里还得多说点，因为，如下文所述，“三位先生”之一的艾沙还曾特意到印度寻找过他。麻木提师长为哈密事变的首领和加尼牙孜的亲信部将，1934年被盛世才收编，任省军第6师师长，驻喀什。1937年出逃印度，后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组建维吾尔同胞独立协会，但混得连一顿白面都吃不上，终客死在日本统治下的北京。按照艾沙的说法：“他曾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日本人，但日本人也让他失望，在失望中伤心地逝去”³。此人还曾将当年年少的、后为三区领导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赛福鼎派送苏联留学。临行前麻木提师长叮嘱：“去苏联后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赤色宣传，不要忘记每天做五礼。若那里没有清真寺，要请他们为你们盖一座。若他们不让你们做礼拜，你们要和你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⁴麦斯武德在麻木提师长亡命境外前便假道印度来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先前来到南京的艾沙会合，并很快南京国民政府的贵客。

伊敏

全名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ammad Amin Bughra），1900年生于和田宗教世家，六岁入其父的经学校，后入和田汉立克学校、墨玉乌巴依巴克学校学习宗教和阿拉伯语、波斯语，1924年就教于墨玉宗教学校，成为年轻的宗教学者。1930年伊敏由和田出发。在库车、库尔勒、吐鲁番、迪化、塔城、伊犁、阿克苏等地旅游6个月，专门在塔城的谢依赫·穆罕穆德·穆拉迪宗教学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此过程中，关于家乡的形势、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敌人的力量

Central Asian Survey.vol.10.№.4,1991,pp.87~113.

⁸ 琳达不谙土耳其文，只是借助他人翻译，有限地使用艾沙的《自述》，因此，研究的深度也有限。

¹ 《阿勒泰杂志》，1944年第1期，第31页。

² “扎吉德”（jadid），源于阿拉伯语 جَدِيد。这是俄国鞑靼人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51~1914）创立泛突厥主义的切入点。“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双泛”中的哪一个。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源自于俄国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扎吉德”教育。它开辟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在造就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麦斯武德等第一批“东突”骨干。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本人的专题论文：《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p. 385.

⁴ 《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得到了较深入的了解。意志得到进一步坚强”。¹返回家乡后与其兄弟艾米尔·沙依甫、满素尔建立了“民族革命组织”(Milliy Inkiab Təxkilati)。1933年2月伊敏在墨玉发动暴动，成立和阗伊斯兰政府，自称帕夏，即“和田王”。伊敏为军事指挥官，领兵攻下且末、皮山、叶城、泽普、莎车、伽师、疏附。1933年11月与泛突厥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Young Kashgar Party)²联手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将有在西亚游学经历的沙比提大毛拉推到前台，伊敏的俩兄弟分别控制着莎车和英吉沙，伊敏则直接管理和阗。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灭亡后，伊敏逃回和阗，再逃往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印度“东突厥斯坦民族统一协会”认为“革命没有结束。但是，曾发生的事件是很有教益的，为我们的将来提供有益的经验”。伊敏应这个协会要求，竭尽全力写一本20多万言的《东突厥斯坦史》，1940年在喀布尔出版。

书中宣扬的核心思想是：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贵、尊严的政治

[تۆرك سياستى تىنچلىقچە رۇم، ئىنسانىيەتچىلىك، توغرا كۆرگۈل ۋە ئالجاناب ئىزەت نەپىسلىدىن ئىبارەت] ³

——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

[چىن سياستى ئىستىلاچىلىق، ئىنسانىيەتسىزلىك ۋە ھىلىگەرلىك] ⁴

——中国是东突厥斯坦人民3000年的敌人……因为，汉族人在世界上的落后民族。它想要发展与改革，但是没能力。⁵

这是“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开山之作，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1980年代，新疆学者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实际上就是伊敏《东突厥斯坦史》的当代翻版⁶。伊敏后来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伊敏在喀布尔期间，转而寻求日本对其独立活动的支持，1942年被英印当局以日本间谍罪逮捕。在艾沙周旋下，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的干预下获释接到重庆与麦斯武德、艾沙汇合，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详述。

艾沙

全名艾沙·玉素甫·阿勒甫金(İsa Yusuf Alptekin)，1901年生于喀什英吉沙县的伯克⁷家族，艾沙因此号称“艾沙伯克”。按照艾沙回忆，其祖父卡斯木曾参加同治年间的暴动，在社会上颇有地位，其父玉素甫就被县知事(县长)要求进了官办汉语学堂。当时清政府要求有地位的地方士绅的孩子必须就读汉语学堂。玉素甫毕业后不久就被委任乡里伯克。艾沙作为伯克之子也被要求就学于汉语学堂。艾沙学堂毕业后任税务官助手。⁸1923年，杨增新义子陈立德任英吉沙知事，艾沙成为县衙的通事(翻译)，并通过教授陈立德维吾尔语的过程中获其信任。1926年8

¹ 穆罕默德·努曼·布格拉，舍尔齐·图尔克斯坦历史，坎努尔，《东突厥斯坦史》，1940，pp.399~400；，《阿勒泰杂志》，1944年第1期。

² “青年喀什噶尔党”(Young Kashgar Party)之名仿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 Party)而成，意识形态上也是源于后者。

³ 穆罕默德·努曼·布格拉，舍尔齐·图尔克斯坦历史，坎努尔，1940(《东突厥斯坦史》)，pp.124~126。

⁴ 穆罕默德·努曼·布格拉 上引书，pp.127~128。

⁵ 穆罕默德·努曼·布格拉 上引书，p. 366。

⁶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钱伯泉：《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根源——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批判》，冯大真主编：《〈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⁷ 伯克系突厥语 bek 之音译，意为首领、头目、官吏、老爷等。古代新疆社会已有伯克。清朝统一新疆后，沿袭伯克旧制，在维吾尔聚居的南疆地区实行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即驻扎军事大臣掌军政实权，一般行政、民政日常事务交由各级伯克处理。伯克制本质上还是一种较落后的封建领主制。随着社会发展，它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暴动，矛头指向清朝统治，也指向伯克制，伯克和伯克制受到严重冲击。光绪十三年(1884年)，新疆建省与内地实行一致的州府厅县制，废止伯克制。但作为乡绅的伯克则依然充任乡一级的官吏。民国时期，乡约制度继续延续下来，但乡约是封建制度的代表，绝大多数无恶不做。连当年的新疆都督杨增新都认为：“新疆乡约之坏，为全国所无，往往与地方官联络一气，以鱼肉百姓”。(引自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集，卷14，页40)

⁸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pp. 34~61.

月随陈立德赴安集延领事馆¹任通事，秘书，就成为中国政府驻外官员，并且驻中亚就是六年。艾沙任职期间游历了浩罕、撒马尔罕、纳曼干、玛尔古兰、奥什、阿拉木图、莫斯科、圣彼得堡、萨玛拉等地，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到过北京，眼界大开，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了中亚民族主义者，从他们那读了许多来自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禁书，受其影响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²作为伯克之子艾沙“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对西突厥斯坦（中亚）的暴政”³，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极为憎恨，如他所言：

我读了一些西突厥斯坦用维吾尔语出版刊物，对这些刊物中反复出现的令人作呕的诸如“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枷锁”、“革命”、“挣脱”、“民族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革命派”、“人民公敌”、“霍加”、“专制”、“独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间谍”等字眼，深恶痛绝，或者是因为受辱和厄运之驱使，一看到这些字眼心里就会很难受。⁴

在中亚的这段经历，艾沙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在东突厥斯坦爆发起义，俄罗斯人就会乘虚而入，我们如何才能迎接自己的解放？”这是他的《自述》中反反复复地叨唠的思想。他在卸去外交官之职后，于1932年10月来到南京，他在《自述》中写道：

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我不是因为喜欢才来中国的南京，而是无奈才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当然形式上依附于中国，但行动上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适当时机来临时，我们就要实现独立。同时我们也反对中国政府向东突厥斯坦派驻军队和移民⁵。

可以说，实现“东突厥斯坦”的“高度自治”到完全独立，成为艾沙的终生奋斗目标。这样，“三位先生”，一位富商出身的泛突厥主义大知识分子，一位乡绅伯克出身的外交官，一位宗教世家出身的能武既文的大阿訇，其社会基础是新疆社会保守的民族宗教上层，除了向往分裂外，就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共同的恐惧。赛福鼎回忆道：

20年代末，巴依、地主们的脑袋耷拉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诸如“地主、巴依被关押，他们的土地被没收，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流放”之类令他们胆战心惊的传闻，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几遍祈祷，要求真主保佑他们这类可怕的事别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不久，一大批受到十月革命冲击的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族的巴依从苏联逃入新疆，30年前后的一两年内，苏联籍的少数民族地主巴依络绎不绝地跑来，我们称之为“逃民”。很快，伊犁、塔城等地的“逃民”也多了起来。许多沙俄军官率士兵逃到新疆，一时间，这些“逃民”竟充斥于伊犁、塔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逃民”大多数是苏联土改时期为保命而外逃新疆的资本家、大地主、大牧主和沙俄军官、士兵。他们到处传播“可怕的”、“令人担忧”的消息。…他们编造这种咒骂布尔什维克的歌谣，发泄对十月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带来恐怖情绪，使新疆的巴依、财主胆战心惊。⁶

资料显示：“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因而持强

¹ 1924年，根据《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苏联在新疆迪化、伊宁、喀什、吐鲁番、阿勒泰等五处设领馆，而中国政府则以对等原则在中亚塔什干、阿拉木图、安集延、斜米、斋桑等五处也设领馆。这些领事馆名义上由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领导，但具体工作事务由新疆省地方政府负责，行政管理上由新疆主管。工作人员由新疆推荐，活动经费也由新疆负担，只须报北京政府备案追认。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68.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126.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68—69.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293~294.

⁶ 《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81~82页。

烈的反苏反共立场。¹

“三位先生”中的艾沙是最先来到国民政府首都，依仗多年的外交官经历所积累了丰富的官场活动经验和较高的汉语表达能力，很快在南京打开局面。但艾沙在“三位先生”中学历最浅，又没有身体力行地参加新疆所发生的武装暴动，²因此，他既仰慕拥有高学历的麦斯武德，也敬仰和田暴动的组织者伊敏。1931年，艾沙在领事馆工作卸任前曾回新疆赴伊犁拜访了麦斯武德，他俩初次谋面就认真地讨论“起义之事”，结论是设法让艾沙先到南京去做国民政府的工作。³1942年，艾沙赴阿富汗专程拜访了伊敏，竭力鼓动伊敏到重庆国民政府去。麦斯武德、伊敏不大熟悉内地官场，又不谙汉语汉文，艾沙为之引荐，并为其充当翻译。这“三位先生”汇聚国民政府的南京、重庆，在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取长补短，结成投靠国民政府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帮派。

二、南京：“中国突厥斯坦之声”

艾沙去南京的表面理由是读书、求学。先是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曾善。王曾善，回族，毕业燕京大学、留学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大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史地官，中国回教协会理事，在政界和伊斯兰宗教界很有权势。在王曾善的安排下，艾沙进了中央大学法学院学习。艾沙入学后再次拜见了王曾善，说求学不是自己的目的，来南京是为了“终止中国人与东突厥斯坦人间的流血”。王曾善答应了艾沙的请求，将他介绍认识了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然后通过戴季陶等人结识了罗文干、贺耀祖、马麟、朱家骅、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的军政高官。⁴1933年5月，时任参谋本部参谋代总长的贺耀祖任命艾沙为参谋本部边务组参议。1933年发生“四·一二”政变，将新疆社会搅得一塌糊涂的金树仁赶下台，盛世才依靠军事实力自任督办掌管新疆军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给追认，在盛世才再三请求下派遣参谋次长黄慕松赴疆“宣慰”。黄慕松的“宣慰”有借此机实际控制新疆。艾沙在贺耀祖力荐下作为黄慕松“宣慰团”的随员，赴新疆转一圈⁵，时虽三十出头，但作为新疆民族代表在南京政坛，崭露头角，而让艾沙名声雀起的是围绕金树仁案件的审判。时金树仁假道苏联回国，艾沙游走南京政坛，以低级外交官出身竟大张旗鼓地告发一省之主席，轰动南京。艾沙控告金树仁十大罪状，但南京高等法庭只支持了一条，即金树仁政府背着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罪名是擅权、卖国。看来，贪腐问题可大可小，但涉及苏俄外交，确实动了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艾沙由此认为祭出“抗俄”旗帜，在南京有很大的活动空间。⁶此外，还有一批头目以受盛世才迫害的“难民”身份相继投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盛世才执政前期实行亲苏政策，特别是与中共合作抗战，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猜忌，而这批口口声声反苏反共的“东突”分子，

¹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32页。

² 据艾沙《自传》，当年他面见流落内地的“同乡”声称：“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爱国主义者”，总会面对“为什么没有参加起义”的质疑。参见：*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204.

³ 艾沙的《自传》记述了当时他俩的讨论：“麦斯武德说：‘我们所做的事便是起义，但我们没有武器，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即便起义了，也没有取得胜利的的必要条件，仍然像以前那样遭到他们的杀戮！俄罗斯人也会趁虚而入，实际上俄罗斯人已经侵入了’。我说：‘我们是否从伊犁派人去中国政府上访？’麦斯武德说：‘我不行。你不能去吗？’。我说：‘为此，我正在努力’。麦斯武德认为我去是合适的”。*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192~193.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207~214.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219~241.

⁶ 按照艾沙的说法，随黄慕松“宣慰团”回南京后，求见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盛世才是亲苏俄的人，非常阴险、凶残、恶毒，万不可任命盛世才为督办。要解决新疆问题，应予新疆高度自治。目前苏俄正在威胁新疆，如果中国政府给予新疆高度自治，苏俄就失去了所有的借口。甚至还可以鼓动西突厥斯坦人民将俄罗斯人赶出去。汪精卫的答复是：你说的很对，盛世才是个很恶毒的人，但是盛世才正在威胁我们说，不让他当督办，我就将新疆赠予苏俄。而我们无力派兵去，目前，日本人又紧逼我们，只能如此。参见：*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243~244.

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的贵宾。

1934年，艾沙在南京成立“东突厥斯坦旅京同乡会”，对外称“新疆同乡会”，自任负责人。艾沙确定的入会基本条件是：敢于向中央政府提出至少给予东突厥斯坦高度自治的要求，敢于提出取消“新疆”而采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的要求，愿意为东突厥斯坦自由而斗争。¹艾沙并着手创办同乡会的会刊“中国伊斯兰教边疆问题专刊”汉维双语的《边铎》杂志。刊头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所题，甚至还请蒋介石、林森、孙科等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贺耀组、朱培德、朱家骅、褚民谊等十几位党政高官为之题词。

蒋介石的题词是：以固吾圉；林森的题词是：策进边氓；

汪兆铭的题词是：导扬文化；孙科的题词是：边陲晨曦。

考虑到贸然打出“东突厥斯坦”有旗号，必不被当局所容，但又不甘心，便将维吾尔文刊名作“چين تۈركستان اوازى”（中国突厥斯坦之声）。所有题词之上都以维吾尔文书写“某某为中国突厥斯坦之声题词”。国民政府的高官不懂维吾尔文，就这样让艾沙愚弄了。按照艾沙的说法，《边铎》编辑部的汉人编辑向政府报告了此事，所刊文章有反华内容。汪精卫专门召见艾沙说：中国不喜欢“突厥斯坦”这个提法，可将这份杂志改名为《天山》，并拨发每月大洋三千²，这在当时是笔很大的数目。《边铎》因此改刊为《天山》月刊。《天山》的创刊号维吾尔文还是“چين تۈركستان اوازى”（中国突厥斯坦之声）。只是第二期维吾尔文方改为：تيانشان (Tianshan)。艾沙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手握有蒋、汪、林、孙最高领导人题名的刊物鼓吹“东突厥斯坦”思想，但毕竟在南京，而用“中国突厥斯坦”³作掩护。后来伊敏在与黎东方大论战时就直截了当地说：“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甚切合学术与政治上之正解名称也”。关于这一大论战将在下文详述。

《边铎》以“本党”（国民党）身份发刊，在“宣达中央德意”、“阐扬本党之三民主义”、“领导反帝运动”的旗号下私贩其货：

独立非谋叛党国论 《边铎》创刊号刊文《南疆问题之分析与其解决之途径》为“独立”全力辩护说：1933年的“东突国”“皆由中央与边民彼此缺乏了解有以致之，初非彼新民有谋叛党国之意”。

独立建国正当论 在另一篇《忠告南疆回族⁴同胞》文中说：“新疆回族……推翻惨无人道的地方政府，以争取自由解放，以推行独立自主，谁也不容否认其正当，谁也不能加以责备或非难”。

土耳其斯坦独立国论 《边铎》第二卷第二期（1934年）刊文《东土耳其斯坦的前途》将

¹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257.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 252~253, p. 259.

³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在北京供职的葡萄牙神甫奉乾隆圣旨，两度赴新疆实地测绘地图。1776年法国神甫钱德明（Joseph Marie Amiot）发表了所测绘的“东、西突厥斯坦”43个地点的地理方位。大概从那时起，西人开始将塔里木盆地称作“东突厥斯坦”。原先俄人将塔里木盆地称为“小布哈拉”与中亚“大布哈拉”相对。1827年俄人季姆科夫斯基（Е.Ф. Тимковский）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报告》，首先提出：“小布哈拉”应作“中国突厥斯坦”。俄人俾丘林（И.Я. Бичурин）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提出：“若是把布哈拉突厥斯坦称作西突厥斯坦，把中国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厥斯坦，那就更恰当些”。事实上，“东突厥斯坦”绝非“东突”分子所宣称的本土古来自有。维吾尔大学者毛拉木萨1908年出版的史书《哈密德史》（تارىخى ھەمىدى）中，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将“东突厥斯坦”这一概念首次引进新疆的，是塔城伊玛目、哈孜鞑鞑人库尔班外里·哈里迪（Kurban wali Kalidi, 1846~1913），他于1910年在俄国喀山出版了一本书《东方全史》，书中引言中首次提到“东突厥斯坦”，但他随后就说：“这里我所采用的是听来的材料”。有资料证明，1920年代，一位批评维吾尔族国会议员的维吾尔族作者自称“南疆人”，即新疆南部人。直至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前后，“东突厥斯坦”才真正时髦起来。详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第78~84页；قربانغلى خالداوغلى : تواریخ خەسە شەرقى اسەندە : كازان، 1910（库尔班外里·哈里迪：东方全史）第2页；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28页；

⁴ 这里“回族”主要指南疆的维吾尔族，而当时所谓的“汉回”或“东干”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回族”。

其独立建国论诉说得更加露骨：“现在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和西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彼此确商，互相帮忙，互相交换意见，通力合作。彼此原是一家。当中的政治问题，我们应当以同胞的关系，互相帮忙。我们的责任，是每个土耳其斯坦人的责任，我们应当负起这种责任，把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把土耳其斯坦造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里不仅要独立，还要建一个包括苏联中亚在内大“突厥斯坦国”。

向往法西斯 《天山》月刊自第二期（1934年）以维吾尔文连续刊出《世界伟人莫索里尼之功勋》，维吾尔文为：**فاتنيزم هم موسسالىنى**（法西斯与墨索里尼），说：“……小国意大利，在伟大领袖墨索里尼的治理下，成为世界最强大与繁荣辉煌国家。世界其他地方处在阶级斗争之中时，意大利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友好关系，国家的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开展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给民族关系以打击，许多问题被压制在疑问状态。而墨索里尼进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给民族主义带来伟大的活力”。（维吾尔文第9页）

不独有偶，当年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也非常向往法西斯主义。如阿济兹（Hüseyin Nihâl Atsız，1905—1975年）就非常欣赏纳粹教义，号召并身体力行地蓄留希特勒式的发型的胡须。¹ 雷哈（Reha Oguz Turkan, 1920~1976）则走得更远，他提醒读者：“最先建立种族主义国家，第一个实行种族主义原则的是突厥人，还不是日耳曼主义的希特勒”。² 艾沙和他的同志与当年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一样，基于其反共反苏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由自主地向往法西斯。

1935年1月，麦斯武德来到南京，得到艾沙的热烈欢迎。经艾沙再三推荐，由贺耀祖出面安排家宴相识³，然后又认识了孙科、陈果夫、白崇禧、朱家骅等政要。麦斯武德为了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捷径，以新疆人民代表的身份控诉当时盛世才投苏卖国，要求中央政府惩办盛世才。南京方面得知麦斯武德不仅学历高，而且反共反苏态度坚决，如获至宝。而这些经过麦斯武德精心包装的举动颇合国民政府高层的心意，不久他就被安置在了由军统控制的参谋本部下设的边务研究所里担任研究员、回文教官，并负责介绍报告新疆的边情。1935年11月，麦斯武德作为新疆代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8年任职于国民参政会。艾沙1936年被南京政府安排为“国民大会”代表。

总之，麦斯武德、艾沙以抗俄为名，大肆推销“中国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站住了脚跟。

三、重庆：新疆突厥民族大论战

全面抗战后，麦斯武德、艾沙跟随国民政府来到汉口、重庆等地，继续从事以“高度自治”为掩护的分裂活动。

力推“高度自治”

1941年2月麦斯武德、艾沙与蒙藏代表为国民党代表会议⁴准备了一份请求案，由麦斯武德发言，艾沙翻译，讲的是请求给东突厥斯坦自治的权利，削弱盛世才的权力，将俄罗斯人赶出东突厥斯坦。宣读之时，吴忠信站起来大声反对说：自治是走向独立的一个过渡渠道，各位是赞成统一还是分裂？由于吴忠信的极力反对，麦斯武德、艾沙提出的“自治”决议也就泡汤了。⁵ 1943年，盛世才投靠国民政府，国民党军开始入疆，引起“三位先生”的极大忧虑。时居兰州的麦斯武德、艾沙，通过贺耀祖关系，拜见了来兰州的蒋介石。后来据艾沙回忆，他当面向蒋介

¹ http://tr.wikipedia.org/wiki/Nihal_Atsiz.

² http://tr.wikipedia.org/wiki/Reha_O%C4%9Fuz_T%C3%BCrkan.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277.

⁴ 会议名称和时间是艾沙的回忆，还须再考。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95.

石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东突厥斯坦的办法，就是要让东突厥斯坦独立，实在不行，还有个八成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给予建立东突厥斯坦联邦共和国的权力”。蒋介石当即生气了，脸都发白了。¹事后麦斯武德和艾沙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提出要建一个“高度自治”政府，中央不得派军队和移民。呈报蒋介石、孙科、陈果夫、白崇禧、朱家骅等政要，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不满。陈果夫拒不见面，孙科、白崇禧见了面却很冷淡。朱家骅火冒三丈质问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怎么提出独立的要求，简直太过分了！艾沙狡辩道：我们没有提出独立的要求，只是提出了接近于独立的自治要求。如果答应了我们这个要求，我们的人民就能抵抗俄罗斯人的侵略。朱家骅无可奈何地对艾沙说：你就是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不点名地严词批评麦斯武德、艾沙：“你们就是想从中国分离出去，你们的自治，就是实现独立的途径”² 尽管如此，麦斯武德、艾沙还是受到国民政府的非常礼遇。

出游中东，解救伊敏

身在重庆的艾沙愈来愈想念流亡印度、阿富汗的麻木提师长和伊敏。适逢“中华民国国联同志会世界协会”拟派遣一个赴南亚、中东国家的抗战考察团。作为该协会名誉会长朱家骅想到了艾沙，决定派遣艾沙出行，另给他配备了兼通英文的新疆籍回族学者马赋良。艾沙一行1938年10月出行，1940年3月返回重庆，历时一年另六个月，遍历印度孟买、加尔各答、沙特麦加、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缅甸等国。³艾沙抵达印度首先找到流亡在那里的麻木提师长，对麻木提师长说：

我这次考察有明暗两个任务。公开任务是完成国联中国组织所交给的任务，表面上站在中国立场上展开抗战宣传工作。秘密任务则是肩负民族的使命。依我看来，您与日本的联系和合作并不是罪过；倘若日本有能力将苏俄赶出我们的家园，拯救我们的人民，有给予我们自由的保证，那我也不持反对立场。⁴

事实上，艾沙每到之处就借拜访各国政要和真纳、尼赫鲁、甘地等社会名流，宣传自己的“高度自治”论。后来随同的译员向朱家骅密告，艾沙是民族主义者，民族沙文主义者，他所到之处都在控诉或指责中国。但朱家骅不置信。⁵其实，最让艾沙上心的就是寻找“和田王”伊敏。当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亡命国外的头目陶非克巴依（Tawfiq Bay）等聚居到阿富汗，声称反苏反共，向阿富汗政府和那里的外国使团游说寻求支持。⁶艾沙的《自述》也证明：伊敏当初曾派一个代表团，商定军需由伊敏提供，阿富汗为我们提供一万名军队，但还未得到武器援助就被迫逃走。⁷这伙人很快与日本人建立联系。日本公使北田正本（Kitada Masamoto）听取了阿富汗外长的介绍“饶有兴趣”，表示愿意见这些反共的流亡者。⁸1935年5月陶非克巴依正式拜访了日本驻喀布尔公使北田正本，向日本外务省呼吁：

喀什以东到哈密这片广大地域的穆斯林是反苏亲日的，因此，可以使日本从思想和舆论方面占领新疆，而不必进行武装入侵，这样的思想攻势可以干扰苏联最薄弱的地区——苏联

¹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08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10, pp. 415~416.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i*, pp. 330~477.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32.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92.

⁶ Wu, Aitche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p.118; A.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 140.

⁷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67.

⁸ Wu, Aitche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p.118; A.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p. 140.

突厥斯坦的局势。¹

此后不久，伊敏化名并乔装打扮从克什米尔潜入阿富汗，一到阿富汗便得到阿富汗政府每月提供的 500 阿富汗元²。他很快拜见了北田正本公使，向日本提出：在日本的支持下，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他试图让日本公使相信，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他向日本保证，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要给日本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³ 艾沙《自述》也证实：

1938 年，即二次大战前，日本驻喀布尔公使一直努力与伊敏建立秘密联络。有一位日本穆斯林为之从中牵线搭桥，于是，他们开始频繁接触。1939 年大战爆发，日本人加快了行动。接着德国驻阿富汗大使也开始与伊敏接触。⁴

伊敏与日德方面的来往引起英印当局的注意，并严加管束。据艾沙《自述》，土耳其大使劝说伊敏：“放弃阿富汗的援助的希望吧，日本人也去不了东突厥斯坦，俄罗斯人也不会把东突厥斯坦让给日本人，你还是返回中国，与艾沙一道革命”。这期间阿富汗当局也劝伊敏：“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要与其他国家联系”。⁵伊敏无奈只好隐居在喀布尔郊外。艾沙 1939 年 12 月 2 日来到阿富汗的喀布尔，费了好大劲才找化名阿不都拉·叶尔坎迪的伊敏，与伊敏商讨如何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事宜达成共识。伊敏抱怨道：“我想去印度避难，但英国人不给他签证。我愿跟你去中国，你帮我办护照。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反中国的，与他们斗。我想通过我的实际行动，让中国认可后我再回中国去”⁶。

艾沙回国途经印度通过驻印使馆给伊敏发去签证。伊敏到了印度不久在白沙瓦被英印政府以日本间谍罪逮捕。艾沙得知后即全力解救伊敏，据艾沙《自述》：

实际上英国间谍一直在跟踪他，在白沙瓦为伊敏设了鸿门宴，夸奖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是深得日本人和德国人器重的人。蒙在鼓中的伊敏透露了他自己做的一些事。于是我拜访了朱家骅，请求将伊敏捞出来。朱家骅下令驻新德里大使馆解救。英印政府有条件地释放了伊敏。伊敏得以来到重庆。要是没有我艾沙向朱家骅请求，就没有伊敏的今天。因为他当年在和田组织、策划了反中国的起义，成立过渡政府，主张借助阿富汗人的力量，把东突厥斯坦从俄罗斯及中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是我把一个曾经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想办法解救出来，最终让他回到中国，而且没有让他受到任何惩罚。中国政府没有计较他与日本人打交道且因此被捕入狱，是我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⁷

这样，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三位先生”终于相聚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麦斯武德、艾沙等动员了重庆高官的盛大欢迎。⁸ 伊敏将自己在阿富汗与日本人勾结之丑事描绘成：

¹ Can,Fook-lam Gilbert, *The Road to Power :Shen Shih-ts'ai's Early Years in Sinkin(1930~3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文化(University of Hong Kong)VII (1969) pp. 224~60; A.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² Wu, Aitcha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p. 136; A.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³ Mildred Cable with Francesca French.*The Gobi Desert*, New York: MacMillan, 1943, p. 227; A.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24.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81.

⁶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82

⁷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25

⁸ 艾沙、伊敏后来主编的《阿勒泰杂志》对此的报导为：“穆罕默德伊敏先生于去年四月六日乘机由印飞渝，夫人暨公子随行，新疆同乡会艾沙，中国回教协会代表赵明远、张裕良、闪克行，组织部代表纳子嘉，外交部代表，林仲民等均往迎接，伊氏下机后向各迎接者握手致谢，九日回协会以茶会欢迎，二十七日新疆旅渝同乡会假座百龄餐厅，以茶会欢迎，并邀各机关文化名流百余人参加，由艾沙主席致欢迎词，伊氏夫妇分致答词，来

在阿期间坚守自持，清苦生活，虽经日寇屡与接洽，思予利用，均被拒绝。每思与我，中央发生联系，终无机会。迨至一九三九年立法委员艾沙奉命赴中东各国宣传，乃赴阿相访，言谈之下，将国内一般情形，及中央抗日建国策，与夫领袖之伟大贤明详述，益坚其来内地之情绪。去岁四月蒙委座令外交部转饬驻印总领事，资送来渝，伊敏君为服从领袖意旨，乃于去年四月六日，携眷抵重庆。¹

伊敏自吹自擂，述及其“革命”经历，历数“进占”墨玉、和田、于田、策勒、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焉耆等处，就是只字不说喀什，避而不谈喀什搞“东突国”之事，看来他心中还是有鬼。这里，应注意其细节，如“委座令外交部转饬驻印总领事”事，还须从国民政府档案中取得印证。

创办阿勒泰出版社：打着“三民主义”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伊敏和艾沙于1944年合伙创办阿尔泰出版社，艾沙当社长，伊敏当总编辑，麦斯武德作为积极撰稿人参与其中，出版《自由报》(*Erk*)和《阿尔泰月刊》。

《自由报》报头名下为：

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

[Dilde, işde, fikirde birlik]²

我们的种族突厥，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我们的祖国突厥斯坦

[Irkimiz Türktür, Dinimiz İslamımız, Yurdumuz Türkistan'dır]³。

《阿尔泰月刊》，创刊号头条为《我们的领袖》，称“溯自中华民国十三年以后，我蒋委员长已成为总理孙先生惟一之继承人，领导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不断迈进，努力奋斗，俾革命大业非惟不致中坠反愈发扬光大，统一全国，其丰功伟烈，诚不胜颂祷也。”

“三位先生”以此为掩护，着力于“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宣传。

一个民族土耳其族论 麦斯武德在《阿尔泰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介绍新疆民族》，认为，新疆被“强分十四个民族”⁴，是不对的，而是4个民族：（1）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子（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六个部落及塔吉克人在内的土耳其族（2）包括内地穆斯林（回族）在内的汉族；（3）包括满、索伦、锡伯在内的一个民族；（4）蒙古族。此外，外来的俄人不是新疆民族。

这似乎在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将6个操突厥语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子、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归成“土耳其族”的6个部落外，还将完全不是操突厥语的塔吉克说成是“土耳其族”，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但政治上构建一个大“土耳其族”以埋下泛突厥主义祸根。须注意，在麦斯武德论证新疆的大“土耳其族”的同时，还刊出《土耳其民族的民族性》，说“土耳其民族性”为富有服从性、富于自尊心、沉毅、体格强健、善斗等。经过如此编排，将新疆的“土耳其族”与土耳其的“土耳其族”混为一谈，可谓居心良苦。

麦斯武德在《阿尔泰月刊》第二期刊文《关于西北政治的话》说：“说活的机会到了！所以我想在阿尔泰第二期上说几句话。……一个陷于冻馁的水深火热中，而面对死亡深渊的人，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不得已有所举动”。这是为“东突”独立建国呼风唤雨。

宾荣祥、唐柯三、孙绳武、谢仁钊等亦分别祝词，情况极为热烈”。见《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1期，第31页。

¹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1期，第31页。

² 此即泛突厥斯坦主义鼻祖伽普林斯基的突厥人“三统一”的土耳其文表述，见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64.

³ 这就是“东突”著名的核心口号“三个我们的”，见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64。

⁴ 1930年代，盛世才当局学习苏联经验在新疆“识别”出维吾尔、汉、蒙古、回、满、哈萨克、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兰其、归化等14个世居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确定：“索伦”和“归化”分别改称“达斡尔”和“俄罗斯”，而“塔兰其”为伊犁维吾尔人不再单独为一民族，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新疆13个世居民族。

新疆突厥民族的大论战

1944年10月13日《大公报》刊出艾沙为主席的“新疆同乡会”1944年向国民政府提出“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其要点为：

——请确认新疆民族为“突厥族”，“维吾尔，哈萨克，阿尔克子，塔兰其，乌子别克，塔塔儿，塔吉克七种名称，乃部落之名称，而非民族之名称”；

——请在宪法中，规定突厥民族自治之条款；

——请修正宪法草案第四条内之‘新疆’二字为“突厥斯坦”。

此提案核心在于：在“突厥斯坦”（新疆）实行突厥民族的高度自治，从相关内容看，这样的高度自治，离分裂、独立仅一步之遥。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¹见到“新疆同乡会”上述“意见”，立即在次日（1944年10月14日）《中央日报》发文全面批驳其“意见”。由此，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1944年10月至11月间，连续刊载了新疆突厥民族的争论文章，《阿尔泰月刊》第二期上辟“新疆突厥民族问题论战辑”²专栏全文转载了论战文章：

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吗？》

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

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 新疆不应称为突厥斯坦》

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

黎东方对“新疆同乡会”的“新疆民族为突厥族”论、新疆改“突厥斯坦”论严厉批驳：

1，引经据典，特别引证布克吞斯（D.Buxton）：“‘突厥’词纯粹语言学性质，……毫无种族的意义。欲通论一般使用突厥语之各族作任何断语，几为不可能之事”；

2，“姑无论维吾尔等七个部族或宗族是否可以一概混称为突厥人，……此七族之外，另有汉、蒙、汉回、归化、锡伯、索伦、满七族，该不是所谓突厥民族一词所可包括”；

3，“‘斯坦’字尾远不如本国文字固有之，‘突厥斯坦’一词不足以代表‘新疆省’一词，……欧美学者每每用‘福儿摩沙’来指台湾，试问应否把台湾也改称福儿摩沙？”

4，“尤其不应该借口血统、语言、宗教，来互分畛域，重蹈中欧与巴尔干的所谓少数民族的覆辙”。

伊敏则公开将其《东突厥斯坦史》上的东西在《中央日报》上贩卖，并“以最礼貌地态度正告黎君”：“谈到新疆问题。首先应当尊重新疆同胞之意见，慎勿以我新疆为无人也”³。《阿尔泰月刊》在编辑此论战专辑前附有“编者识”云：

这次伊敏先生与黎东方先生的论战是因为《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突厥民族问题所引起的。在新疆同乡会提出关于新疆民族是突厥民族时，他们是有历史上和传统上的根据的。现在看了论战文以后，尤其是最后一篇伊敏先生的《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人》一文，文中确切地引用历史证据及其他学者的理论，使我们深一层的认识新疆同胞是突厥是正确的。⁴

这就是《阿尔泰月刊》鲜明的“东突厥斯坦”立场。伊敏在论战中特别强调：

——（若不承认突厥民族自治）能否将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取消而成二民主义？⁵

¹ 黎东方（1907~1998），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华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²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5~22页。

³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14页。

⁴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5页。

⁵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13页。

——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甚切合学术与政治上之正解名称也。¹

如此看来，伊敏鼓吹的“中国东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别无二致，只是背靠国民政府，挂着“三民主义”羊头贩卖“东突厥斯坦”思想之狗肉。至于伊敏为何投靠蒋介石国民政府，六十年后的一位“东突厥斯坦”民族主义者是这样解释的：

和田起义以前，伊敏把全疆转了一遍，他说我们目前暂时不能要求独立。有苏联在，一旦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国家，……苏联会担心中亚西土耳其斯坦也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肯定会出兵。独立不会达到目的，即使蒋介石把我们放了，让我们独立，苏联也会把我们吃掉。因此他说还是暂时留在中国好，高度自治。当时那些维族的领袖和蒋介石的关系为什么好呢？因为比苏联来说，蒋介石政府好一些，暂时留在中国，比面对苏联好一些。²

其实，这只说了一方面，即伊敏反苏的一面，另一面是正是因为他坚决又反苏又反共，才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青睐，两者间在政治上是相互利用，同时，蒋介石确实也被他打出的三民主义旗号所迷惑。

四、迪化：“中国突厥斯坦”

1945年9月上旬，三区民族军分三路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前锋进抵距首府迪化（乌鲁木齐）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迪化城仅六个营的兵力，驻守迪化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电蒋介石：“迪化危在旦夕”。9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赴迪化，主持新疆军政。麦斯武德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艾沙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伊敏国民党中央监委候补委员等身份随张治中飞抵迪化。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与三区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改组省政府成立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为副主席的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任监察院驻新疆监察使，伊敏被任命为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三青团新疆分团干事长，艾沙被任命为省联合政府委员。在此期间（1946年9月15日）艾沙受到蒋介石的第二次接见。³



（艾沙面见蒋介石）⁴

1947年5月1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请辞省主席之职，推荐麦斯武德继任。⁵5月20日国民政府

¹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22页。

² 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香港：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43页。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780.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581.

⁵ 关于举荐麦斯武德一事，张治中的回忆是：“当初可考虑的人选，只有麦斯武德。他当时充任新疆监察使，是维族中负有声望的人。因反对盛世才逃亡内地，在中央十多年，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

发布政令任命麦斯武德为省主席，伊敏为省副主席，艾沙任省政府秘书长。可以说，这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政治舞台上最嚣张的时期。

委任麦斯武德的省主席后，张治中立即面对两件始料不及的事：

一是麦斯武德的任职立即遭到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对，甚至成了国民政府与三区根据《和平协议》所搭建“联合政府”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把持新疆政要后，主要通过其掌握的报刊贩卖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立即公开推行“中国突厥斯坦”“自治”。

1945年8月在新疆迪化发行了纸币，正面“新疆省”字样，背面维吾尔文被他们偷天换日译成：“چىن تۈركىستان”（中国突厥斯坦）¹。

“三位先生”公开地宣传：从中国的长城到南斯拉夫广阔地区的人民都是同一个民族，统一的整体，我们的总称是突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摆脱中国，防止俄罗斯的侵入。我们不能作为软禁者而接受共产主义，我们决不能东突厥斯坦成为第二个西突厥斯坦。²艾沙甚至主动邀请亲自拜访各地县的专员、县长、警察局长，告诫他们：“正确的道路是民族主义、突厥主义，中国、苏俄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人固执、愚昧而狡诈，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当枪使”。³据艾沙《自述》，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刘孟纯以省政府名义准备一份公文称：“特通知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和秘书长艾沙，从此不得将新疆称作‘突厥斯坦’，也不得将新疆人民称为‘突厥族’。”麦斯武德从艾沙手中接过公文，扔在地上，生气地说：不行，竟还将这样糟糕的指令下达给我们俩位穆斯林突厥人，坚决不行！⁴反苏反共的“东突厥斯坦”运动在国民政府卵翼下非常的疯狂，伊宁方面指责“三位先生”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艾沙则说：“然而，我们以泛突厥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为至高无上的荣誉”。⁵张治中后来回忆道：原以为麦斯武德是“爱祖国爱民族的人”，“但是当他充当主席之后，他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他表现得顽固无能，完全受少数人包围。他不但反苏，而且逐渐反汉、反中央了，甚至提出‘高度自治’的论调了”。⁶

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三区革命派与麦斯武德等“三位先生”势不两立。但资料显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 1885~1976）与“三位先生”却有秘密联系。艾沙《自述》就说到，当年在返新疆前与麦斯武德还居住兰州时，曾分别接到艾力汗·吐烈密信：“我们的国家成立了，你们的愿望也实现了，请你们返回祖国，与我们一起管理国家”。⁷而与此相印证的是，多年后，艾力汗·吐烈的孙子乌外思汗（Увайсхан Шакиров）著书说：艾力汗·吐烈得知麦斯武德等“三位先生”抵达迪化，就对其亲信说：“麦斯武德、伊敏、艾沙都是知识渊博的人，为突厥民族统一而战斗的维吾尔族爱国战士、政治家，让阿合买提江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表达我们为突厥民族团结的意愿吧。但是阿合买提江没有听从艾力汗的意见，而是按照苏俄人的指示反对麦斯武德”。⁸可以看出，投靠国民党的“三位先生”一度把持了新

常在中央会议上大胆直言，抨击盛世才，并极力为新疆人民诉苦，代表新疆人民利益说话，大家公认他是新疆的领袖人物。年初我在南京向蒋报告新疆问题时，蒋曾提到他，并问我：让他当新疆主席怎样？我想，如提他继任主席，中央一定容易通过。他家在伊宁，伊方和谈时三位代表中赖合木江，就是他的胞侄，在伊宁有众多人事关系。我推想提他继任，可能得到三区同意，至于其余七区，从未听说过反对他的人”。《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0—542页。

¹ 蔡杰华：《从钱币上的“偷天换日”看“东突”的分裂图谋》，《新疆钱币》2009年第3期。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510.

³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91.

⁴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511.

⁵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61.

⁶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第571页。

⁷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434.

⁸ Увайсхан Шакиров: *Алихан Тура Сағуни*, (Ташкент: Мухаррир, 2013), p.195.

疆政务的主要领导职务，与一度窃取“三区革命”主要领导的艾力汗·吐烈，分属新疆两个政治营垒，但毕竟在内心上相通。

1949年4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5月24日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加紧同新疆的“东突”势力的勾结。他早就说：“新疆是在我们手里，新疆有我的军队，新疆人民听我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穆斯林”。新疆的“东突”势力也想依靠西北“二马”（马步芳、马鸿奎）作垂死挣扎。艾沙认为，我们走中央路线（指投靠国民党）人现在吃不开了，那只好依靠西北“二马”。¹6月，尧乐博士去兰州活动，8月艾沙率“新疆各族人民献礼团”向马长官致敬。艾沙声称要组织十万维吾尔青年给马步芳当兵，并与“二马”商讨在西北共建一个独立的“回教国”。他们密谋软禁陶峙岳以马呈祥代之，推翻包尔汉以伊敏为省主席，夺取新疆大权。他们还企图在“二马”支持下在新疆建立“突厥穆斯林”军以对抗人民解放军，²但这一切随着新疆和平解放而破灭。

五、土耳其：“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

1949年8月，兰州解放，新疆的进步人士在为迎接新疆解放而努力。这伙“东突”分子竭力反对新疆和平解放，失败后，伊敏、艾沙经南疆逃窜出境，到达克什米尔立即将“新疆侨民旅居克什米尔同乡会”改组为“东突厥斯坦侨民联合会”，该会成为境外“东突”势力活动的基地³。

后受印度政府的限制和驱逐，伊敏和艾沙先后移居土耳其，境外“东突”势力的活动中心从此转移到伊斯坦布尔。伊敏和艾沙一到土耳其，就创办了“东突厥斯坦流亡者协会（Doğu Türkistan Göçmenler Cemiyeti）”，出版杂志《东突厥斯坦之声》（土耳其文：Doğu Türkistan Sesi，维吾尔文：شىرقى تۈركىستان آوازى（东突厥斯坦之声），如以色列学者雅各布·莫·兰道指出：

其公开宗旨虽是帮助土耳其读者了解突厥斯坦历史、文化，指导突厥斯坦来的移民怎样适应土耳其生活，但许多文章、诗篇却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和泛突厥色彩，如直接抨击“红色帝国主义的罪行”，攻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谴责苏联的灭绝政策等⁴。

伊敏、艾沙流亡国外后仍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络。1951年至1957年间，流亡在土耳其的伊敏与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有书信往来。朱家骅以“一论所谓新疆问题”、“二论所谓新疆问题”、“三论所谓新疆问题”三次复函伊敏。⁵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毫不掩饰地透露出的”政治主张和“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三次复函一方面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据理驳斥伊敏独立之理由，另一方面是忆起“昔在重庆南京，时常与您晤谈，推诚相见”之情谊，苦口婆心地劝告：

其实我在信中只是说您不应倡议所谓新疆独立，以免分散力量，自乱阵容，给予敌人以加深割裂和立足的机会。须知我们所面对的，是非常顽强而奸险的敌人，我们合起力量来，还要经过极大的牺牲，才能扑灭；若是我们力量分散，无论您和您的同志是走哪一条路，都是没有单独幸存的道理。为今之计，惟有不分以前的恩怨，团结一致，构成反共反俄的联合阵线，对新疆的问题，您我的意见容有不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循大同消除小异。到了反共

¹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39页。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p.530~531;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双泛”内部参考资料汇编》第一辑（打印本），新疆社会科学院，1990。

³ 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第12页。

⁴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3.

⁵ 此三论“所谓新疆问题”收入《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页668~695。

抗俄大业完成以后，则各种政治意见，都可循民主宪政的方式，以求解决。¹

台湾国民政府还多次拨款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分子，予以支持。1952年，土耳其一位高官伊赛达拉（Esendalla）要求艾沙、伊敏“与福摩萨（台湾国民政府）合作，不要搞僵”。艾沙说：“当年您也曾这样劝过，但我们未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任何东西，他们现在也无力与我们合作。”² 1954年，伊敏和艾沙去台湾，试图说服国民政府放弃新疆，国民政府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³ 1956年伊敏、艾沙在新疆籍华侨中散布说：我们在美国人支持下已和蒋总统达成谅解，他们反攻大陆，我们“反共复国”将来成立东突厥斯坦国。蒋介石对“独立同盟”很恼火，让伊敏、艾沙将“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改名为“新疆反共同盟”。但伊敏、艾沙就是不买蒋介石的帐，⁴ 最终与国民政府分手。

伊敏、艾沙分别于1965年、1995年病故于土耳其。艾沙之子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 1939—）子承父业，成为“东突”组织“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首任主席，当年随同伊敏去土耳其的亲侄子里扎·贝金（Mehmet Rıza Bekin, 1925~2010），入土耳其军队服役，军衔至将军，一直充当土耳其“东突”组织的特别顾问。如果说“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首任主席艾尔肯是“三位先生”的徒子，那么其现任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则是“三位先生”的徒孙。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此即“三位先生”及其徒子徒孙的逻辑。

文中 维吾尔文若排文有乱码，可用如下截图

第2页 注释5, كانۇل , 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 تارىخ: مۇھىمەد ئىمىن بۇغرا

第3页注释1, 2, 3

第3页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贵、尊严的政治

[تۈرك سىياسىتى تىنچلىقچە رۇھر، ئىنسانىيەتچىل، توغرا كۆرگۈل ۋە ئالجاناب ئىزەت نەپىسلىدىن ئىبارەت]

第3页 ——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

[چىن سىياسىتى ئىستىلا چىلىق، ئىنسانىيەتسىز لىك ۋە ھىلىكەرلىك]

第6页 چىن تۈركىستان اۋازى (中国突厥之声)

第6页 تىيانشان (天山)

第6页注释2 تارىخى ھەمىدى

تارىخ خەسە تىسرىقى اسمىندە : فەربانغلى خالداۋغلى

第7页 فاشىزم ھەم موسسالىنى (法西斯与墨索里尼)

第12页 چىن تۈركىستان (中国突厥斯坦)

第13页 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 اۋازى (东突厥斯坦之声)

¹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684页。

²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p. 364.

³ Mohammed Sa'id and Mohammed Aziz Ismail, *Mosle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52, Translated by U.S. Government, Joint Publications Service. Tehran, Iran: Privately printed pamphlet, published as vol. 1, 1960 (Hejira 1380); translation printed in Washington: JPRS 3936, September 19, 1960; A. D. W.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⁴ 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第34页。

【论 文】

应始终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不动摇¹

黄选平²

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作为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和文化，在中国已有 1300 多年的传播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一方面要抗衡多种文化的冲击，保持自己宗教信仰体系和礼仪制度的传承；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又必须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本土环境、政治制度、民族群体、文化习俗等发生密切关系而逐渐实现中国化。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少数民族，就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经历本土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他们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穆斯林群体。实践证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始终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方向，是我们须臾不可动摇的原则。

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必然、成功的路子、现实的选择、宗教的希望。

首先，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文明进步的高天厚土。宗教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融入所处社会、根植当地土壤，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伊斯兰教之所以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上扎根、生存和传承，就是适应国情、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自觉地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结果。

其次，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经验。伊斯兰教在中国 1300 多年的传播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初传中国的唐宋时期，还是元明两朝以后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乃至清代至民国时期儒道思想与穆斯林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时期，尽管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将其贯穿起来，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均能和谐相处、相融共进，各个时期中国的穆斯林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第三，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发展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的必由之路。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从传入中国大地，到形成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始终坚持了本土化、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伊斯兰教只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坚定走好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发展道路。

第四，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包括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伊斯兰教，用中华文化浸润伊斯兰教，不断增进伊斯兰教对中华文化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宗教界确立正确的宗教观和祖国观提供更多的文化养分；必须深入挖掘宗教道德文化和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契合点，不断提升伊斯兰教的道德文化层次，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宗教理念，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强大力量。

始终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不动摇，要重点把握以下原则和要求。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10月25日第6版。

² 作者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坚持爱国与爱教相统一，同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伊斯兰教认为，“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爱国爱教、两世吉庆，是穆斯林的普世价值观。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中，广大穆斯林始终把自身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人民幸福作出了贡献，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关键在于坚持爱国与爱教相统一，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当好爱国公民和虔诚穆斯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维护伊斯兰教的和谐和平，不断加深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思想认同。关键在于坚持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一致，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目标一致，信仰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最高国家利益，把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民族整体利益，同心同德、凝心聚力，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关键在于坚持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思想、教义教规、道德文化、组织体系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时代要求、主流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接融合，使伊斯兰教始终根植于本土化土壤，始终沿着中国化方向健康传承发展。

坚持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契合，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伊斯兰文化独具特色，二者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交相辉映、深度融合、协调发展。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文化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是从外来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相融开始的。明清时期的“以儒诠经”活动，就是以中国社会占主导的儒家文化来弘扬本土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的一次两种文化相融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有益探索。其中，以“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中正之道”、“和为贵”为核心的一系列认知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形成了契合点，使两种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不动摇，重在坚持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契合、融合发展。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启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深度挖掘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适应社会发展、适应群众需求的积极元素和时代价值，积极融入当代社会和主流文化中，不断充实和拓展中华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坚持政教分离，依法保障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我国历来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历朝历代遵循政权高于教权，宗教必须接受政府管辖，教权必须服从国家政权。在这种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崇尚和谐、共生共荣、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深深渗入到我国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使中国穆斯林“顺主、尊圣、服从执政者”成为优良传统，**使国法与教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国家治理和伊斯兰教传承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政教关系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重在正确处理好党教关系、政教关系、法教关系以及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政府也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只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加快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

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法治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保护下遵循教规教义、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全面提高伊斯兰教中国化、法治化水平；必须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宗教不得超越其他宗教享有特殊地位，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各宗教及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要彼此尊重、和睦相处。

坚持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交往、相互交融、相互尊重，全力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各宗教在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个血脉相连、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温暖和和睦的大家庭。推进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中国化，各民族、各宗教之间一定要加强相互交流，充分发挥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的作用，经常开展宗教思想、宗教道德、教义教规等方面的交流，形成具有中国品格的宗教思想、宗教精神、宗教气魄，充分体现和展示我国宗教的特色和魅力。一定要加强相互交往，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像各民族亲密交往那样促进各宗教友好交往，像各民族亲如一家那样带动各宗教团结和睦。一定要加强相互交融，既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互融互鉴，又推进各宗教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使中国各宗教在中华文明大家园中和合共进。**一定要加强相互尊重，各民族、各宗教在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尤其要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宗教礼仪、宗教符号和宗教习俗，互相尊重就是推进宗教中国化。**如中国穆斯林每逢伊斯兰教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重大节日，各民族之间相互庆贺共度，并把古尔邦节亦称为“忠孝节”，从节日活动和称谓上均包含浓厚的中国色彩。在生活习惯上，中国穆斯林除饮食禁忌等方面坚守宗教仪规外，衣着服饰、婚丧嫁娶等方面都已渗透着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清真寺是穆斯林开展宗教活动的神圣殿堂，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很多清真寺的建筑就长期保持着中国传统殿宇寺院风格。现在，一些地方修建的清真寺一味推崇阿拉伯建筑风格。我们应该按照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方向，科学规划、依法管理、积极引导，真正形成突出中国特色、兼顾“中阿合璧”的民族建筑风格。

坚持国民教育与经堂教育相结合，大力培养爱国爱教的高素质教职人员队伍。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中，人才始终起着关键作用。从明代众多“回儒”广泛开展的“以儒诠经”活动，到清代一批穆斯林经学家、汉学家倾力推动的“经书并授”行动；从民国时期杰出大阿訇、大学者倡导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创办的伊斯兰教经学院教育，**都坚持国学教育与经堂教育相结合。既以国学教育诠释经典教义、厚植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根基，又以经堂教育传播国学文化、传承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二者兼容并蓄、相得益彰，结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累累硕果。**新形势下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下功夫培养一批扎根中国土壤、传播中国能量、传承中国宗教、维护中国利益、促进中国和谐、符合中国方向的伊斯兰教合格教职人员队伍。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创新培育方式，完善培养机制，拓宽培训渠道，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确保宗教教职人员的政治觉悟和宗教学识双提高。要本着“利用传统、走出传统”和因俗而化、因势利导的原则，把传统的经堂教育与现代国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国民义务教育+经堂教育+宗教院校教育”的模式，建立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培养制度，努力培养壮大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骨干力量。

【论 文】

新疆文化发展战略再思考

王鸣野¹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同时更是一个因文化的差异而衍生的政治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因此，文化的政治性和政治的文化性是新疆地区文化问题展现出的最大特点。基于此，在制定新疆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时，以下几个问题必须高度地和持久地予以重视。

一、多元文化共存中的主体性问题

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所谓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多元文化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架构与格局安排中发展的问题，因为多元文化中的每一个“元”和其他“元”的关系不可能是等量关系，同时每个“元”与现代世俗文化的相容度也有很大差别，从而决定了每个“元”对新疆现代化进步的贡献度也是不一样的，由此便决定了一定的制度架构和格局安排是新疆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结构形成的必要条件。

制度架构涉及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民族文化与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关乎的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所倡导的是现代的世俗制度和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流动性和消费指向性和新疆少数民族的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的冲突性展示出越来越剧烈的政治冲突性，其核心就是国家认同的错位。

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方面，我党制定的原则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要相适应，但需要清楚的是，是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适应宗教，而新疆乃至其他地区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似乎在适应宗教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失去了对宗教及其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引导作用。如此一来，造成的结果就是宗教引导和整合社会，使多民族地区以宗教文化为分野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和文化格局难以建立。可以预见的是，新疆现代化文明越发展，宗教文化的对抗性就表现的越强烈。

于是，面对两种难以包容的文化，必须确立一种文化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新疆文化发展方面的理论与制度架构。文化发展的格局安排指与主体性文化的发展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布局（如各级世俗教育机构、宣传机构、文化机构等），涉及的是主体性文化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其他文化的引领与整合作用问题。如果说新疆目前文化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宗教文化（或文明）与现代世俗文化的冲突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共产党的疏远和国家意识的淡漠），那么文化发展中的格局安排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性思考方向之一，如学生在什么地方接受世俗教育较不会受到宗教价值观的冲击，大学设在哪个地区可以使青年学生的思想比较少地受到极端宗教文化的感染，同时，在本不应该建立大学的地方建立的大学可能会给极端分子提供平台，使本来涉世不深、思想质朴的青年学子很快变成极端思想的接受者。

文化发展的制度架构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新疆的多元文化中哪种文化占据主体性地位对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最为有利，尤其是有利于在新疆形成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格局。考察这个问题需要依据以下几条标准：（1）主体性文化的底色必须是世俗性文化；（2）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引领性；（3）具有塑造中华认同的能力；（4）这种文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没有展示出极端性、排他性和反现代性；（5）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¹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 副教授。

展的消极因素有天然的免疫力；（6）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相比较而言最容易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政治文化相适应。不难看出，新疆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完全符合上述要求，而是在各民族文化当中不同程度地展现出上述六个方面的某些特点和要求。因此，新疆的多元社会中的主体性文化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后天锻造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文化的独占，而是各民族文化中优秀成分的有机融合。融合性是新疆主体性文化的最突出特征。

二、多元文化共存中的竞争性问题

不可讳言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所展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竞争性甚至冲突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一点既是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文化政治性的根源同时也是文化政治性的结果，根源和结果相互强化，使得文化和政治密不可分。

新疆多元文化的竞争性基本上是非正式的、社会性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地区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也很正常，但问题是在这种竞争中参与者是用自身文化中的什么优秀品质（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的筹码以及以什么理由（法律理由、身份理由、人口理由、历史理由）要确立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笔者以为，多元文化的竞争依循的标准应该是前述主体性文化的六条标准，不能以法律、身份、人口和历史的理由强行树立某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竞争应该成为形成新疆以融合性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性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还应注意的，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本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解读也是大不一样的，体制内的群体较多注重文化中的世俗成分，体制外的群体则更多地看重宗教及其相关因素，结果多多少少都形成了体制内文化认同和体制外文化认同的区隔。对宗教因素的看重很可能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竞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从而引发民族冲突和分裂主义意识。在族群内部，体制内文化认同和体制外文化认同同样会变成政治性问题：世俗文化要求的世俗政治和宗教文化要求的反现代的、中世纪式神权政治的对抗；认同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可能是在体制内的政治和利益认同）的领导地位和反对这种地位的对抗。因此，在文化的竞争过程中，一定要厘清政府、现代世俗教育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就是要用现代的、世俗的、爱国主义的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的竞争和融合，引导宗教文化自觉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尽量减弱其对现代化进程的抗拒性。

多元文化竞争的第二种表现是对次地区文化主体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其实是维吾尔之外的新疆其他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占优势的维吾尔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不断蚕食的环境中追求自身文化生存的一种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民族在展现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表现出极端性、排外性和分裂性，而且其所表现出的国家认同意识对新疆主体性文化的构建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民族群体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渴望在总体上有利于形成一种均衡的、多元一体的新疆文化发展格局。这一点同样有利于主体性文化的构建。目前，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政策中值得探讨的就是怎样强化对人数比较少的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扶植。

多元文化竞争的第三个表现是强化本民族文化的全疆性乃至全国性存在感。目前，这种竞争主要集中在浅表层次的表现性文化而非深层次的观念性文化方面。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政府应该制定专门的政策扶植人数较少的新疆少数民族在全疆乃至全国展现本民族的表现文化或舞台文化，如此一方面可以带动这些民族所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民族在展示自身的文化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如果说前两方面的竞争是非正式的和社会性的非体制性竞争的话，那么窃以为后一种竞争由于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扶植而更具体制性色彩。这样做并非不合理，原因是如果不采取保护性的发展政策的话，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文化很可能面临两种后果：一是被占优势的新疆民族文化淹没，一是被彻底遗忘。前一种后果不利于在新疆形成均衡的各民族文化格局，可能使本来没有民族分裂意识的民族群体也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后一种后果则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新疆地方而言都是文化保护方面的损失。

【论 文】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¹

娜 拉²

摘要：文章认为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口和民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因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口变动、分布状况无不影响着民族关系，原住民、难民、殖民、移民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空间分布格局。

关键词：新疆 民族人口 分布

一、

对于新疆人口的统计最早见于清乾隆时修纂的《西域图志》，当时新疆总人口为 383750 人。道光三十年（1850）全疆只有 734389 人^[1]，新疆建省后 人口大增。据宣统元年调查 新疆省共有 412596 户，2017931 人。其中南疆人口达 180 万人，北疆不足 30 万。就整个新疆的户口统计，北疆虽为全疆政治中心，但民户明显低于南疆。这种南北人口比例格局特点，从清代中后期便已定型，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

据各种资料显示，民国年间，新疆人口数量统计存在误差。有人认为 1916 年新疆总人口为 227.8 万人，到 1926 年则达到 268.1 万人 1916-1926 年 10 年间，人口增加了 40 余万人^[2]。据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提供的 1928 年新疆人口信息，“新疆总人口约为 3 053 000 人。其中乌兹别克和维吾尔人 1 700 000，柯尔克孜和哈萨克人 300 000，汉人 300 000，东干 161000，蒙古人 230 000。剩下的 300 000 人分别为塔塔尔、塔兰奇、塔吉克和刀郎人”^[3]。

据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载，民国元年至民国 17 年间人口变动如下表^[4]：

数据来源	户数	男女合计数	每户平均人数	性比例
民国元年内务部统计表	461 961	2 097 763	4.54	112.8
民国 8 年邮政局报告	-	2 519 579	-	-
民国 9 年邮政局报告	-	2 519 579	-	-
民国 14 年邮政局报告	-	2 688 305	-	-
民国 17 年内政部统计	530 910	2 551 741	4.81	124.3

曾问吾认为，民国以来，新疆人口最多的为维吾尔族，其次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又次之，回、汉、满及其他各族又次之^[5]。这与斯文·赫定提供的民族人口比例有出入。如蒙古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在斯文·赫定提供的资料中却是前者少于后者。笔者认为：“各族人口数目及全省总人口数目均无确切调查”^[6]。这是形成数据多样化的原因。1936 年来自内政部统计，新疆总人口为 436 万人^[7]。

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处于自然灾害、军阀混战、内战、抗日的社会环境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新疆地区政局不稳定，苛政日甚、民族矛盾升级、生产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新疆民族人口的变动。新疆在民国年间人口属连续增长型。不同年份人口总数的增长指数：设定 1912 年为 100，则 1928 为 122.4，1936 年为 207.8^[8]。人口密度：1912 年为 1.27，1919 年为 1.53，1925 年为 1.63，1928 为 1.96，1931 年 2.35；1936 年为 2.69（人/平方公里）^[9]。

¹ 本文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 年第 3 期。

²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二、

1935年，新疆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会议对新疆的民族划分和称谓作了具体规定，确定新疆有14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兰奇、归化、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儿、索伦、满等。1949年，新疆除以上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0.09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0.02%。

维吾尔族。清代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地区，其次是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北疆地区有一部分塔兰奇人，即早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准噶尔贵族强迫一批南疆的维吾尔人到伊犁河上游屯垦。塔兰奇为准噶尔语，意为“种田人”。乾隆时期，清政府根据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的提议，迁移南疆维吾尔族去伊犁屯田。以后，由于伊犁河谷土地肥沃，粮食收成好，吸引志愿者前往。到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达6383户。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的又一聚居区。随着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乌鲁木齐定居的维吾尔人不断增加，到清末有万人左右，从阜康、玛纳斯等地也迁来不少维吾尔族。清末，全疆维吾尔族人口达157万，占全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据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的统计，维吾尔族达2988528人。以莎车、疏附、叶城为人数较多。

汉族。清代实行屯田政策以来，大批汉族人陆续由内地迁至新疆。18世纪中期，屯田者中大部分为绿营汉族官兵。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湖湘弟子遍天山南北。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又大力重建经济、裁兵分屯、移民实边，使大量汉族移民新疆。清末民国时期，有不少汉族到新疆种田、经商或为官。

1929-1930年，陕甘地区因发生饥荒，此两地大量饥民涌入新疆。1944年底，从河南、河北、山东等省迁移到新疆的难民共有17300余户，大都被安置在北疆各县。20世纪40年代初，蒋介石提出“预定十年内移足百万人口”到新疆。1944年，计划从河南、陕西二省移民2万人，但由于吴忠信的反对，实际移民仅数千人。年底，开往新疆运送移民的“垦民车”停止^[12]。汉族主要集中于北疆地区，1944年，据新疆省警务处的统计资料，人口222401人。北疆地区的汉族人口的比重为65.0%。1949年，新疆汉族人口为29.10万人。以迪化、奇台、绥来（今玛纳斯）三县市人数较多。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塔城、阿尔泰、伊犁、乌苏、焉耆等牧区。其主要来源有三。一为厄鲁特人。乾隆时期，北疆准噶尔部在战争及疫祸之后，劫余尚存4.4万余人。清政府把准噶尔余众及从内地遣回的厄鲁特兵丁组建为“厄鲁特营”，隶于伊犁将军，驻守伊犁、塔城一带，巡察边防。民国时期，退伍为民。民国6年，厄鲁特营有人口25889人。二为察哈尔蒙古。1762、1763年，清政府分两次调防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营兵到新疆，小部分留乌鲁木齐，大部分至伊犁组成察哈尔营，设一领队大臣统领驻防伊犁、博尔塔拉等地。民国时期，退伍为民。三为东归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蒙古以及民国初年从外蒙古迁至吉尔萨尔的土尔扈特人。

察哈尔营于乾隆年间初迁来时，人口约5000左右。至嘉庆年间（1796-1820年），察哈尔营人口达1.14万^[13]。同治年间，由于受兵变及沙俄、阿古柏入侵的影响，察哈尔营人口下降，同治十年（1882年），察哈尔两翼有“大小人口九千零二名”^[14]。至民国年间，察哈尔人口未有大的增长。民国27年，裁撤察哈尔营制，纳入民政管理。宣统三年，有300户察哈尔人越库克他乌边界迁往外蒙。谢彬在《新疆游记》中提到民国6年（1917年），察哈尔营有人口16023人。

据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全疆蒙古族人口59686人。以和丰、和靖、昭苏人数较多。

哈萨克族。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因战乱、自然灾害而长期处于流浪迁徙，即驻牧地不断变化的状态中。1884年，阿勒泰地区1000余户哈萨克族迁往科布多。以后有不少人迁往今昌吉、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1914年，中俄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1912年7月之前迁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一律取消俄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1916年，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反抗俄国政府征兵遭

镇压，大量难民逃入中国境内。在乌什、塔城一带，逃入的哈萨克难民有六七万人，伊犁一带逃入的哈萨克难民达16万人。1918年，难民相继返俄，而留牧新疆者为数亦多。1936-1939年，盛世才政府对哈萨克族实行苛政，使大批哈萨克牧民向东迁至甘肃和青海一带。约有3000多户、20000名哈萨克人东迁甘肃和青海寻找新牧地，分别居住于甘肃的张掖、酒泉、敦煌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由于与当地居民发生草场纠纷问题，经新疆、甘肃两省政府协商，从1947-1948年，共有6500多名哈萨克人被遣返新疆，被安置在镇西、伊吾、木垒、奇台等地。

由于不断的迁徙，民国时期，新疆境内哈萨克族人口及分布态势处于变动之中。1926年，全疆哈萨克有毡帐4万顶，人口约20多万，而1928年，据国民经济讨论处统计，为43.7万人，占全疆人口的12.5%^[15]。1933年，据内政部统计，为47.7万人^[16]。增长率为9.15%，平均年增长率为1.83%。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的数字为438575人^[17]。增长率为负8.06%。1949年为443655人。以额敏、特克、巩哈等地人数为较多。就全新疆省来看，哈萨克族以北疆地区为主要聚居地，且分布地域广。

柯尔克孜族。民国初期，新疆布鲁特回部，“以喀什为总汇。散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蒲犁、叶城、乌什诸边境”^[18]。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势力后，柯尔克孜“地界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地广人众”，“杂处于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之深山密林中，安居游牧”^[19]。1916年，中亚地区柯尔克孜人反抗俄国政府征兵，15万人逃至中国境内的伊犁、乌什、阿克苏、伽师、喀什等地。由于民国时期新疆以民族成分为单位的人口统计资料较少，1944年，倪超著《新疆之水利》，首次见按民族成分对新疆地区人口进行统计的资料。所以，我们多以地区来大约估算。1935年，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地乌洽县有柯尔克孜族2619人，占全县人口的96.28%。1949年乌洽县共有人口10920人，其中柯尔克孜族人口统计缺，约占95%以上。1944年，阿合奇设县后首次公布全县人口数，总人口10980，其中柯尔克孜族10863人，占全县总人口98.6%。1949年，阿合奇全县有人口11288人，其中柯尔克孜族10827人，占95.9%。阿图什县最早有人口记载的是1943年，当时全县有9301户，46786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最多，为46689人。而柯尔克孜族仅有63人，其他民族34人。此后，人口逐年增加，到1949年，全县有12739户，68075人。其中维吾尔60383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8.7%，柯尔克孜族7437人，占10.9%，汉族128人，占0.19%，其他民族127人。总之，民国38年，今新疆克孜勒苏州境内柯尔克孜族人口大约在4万人左右^[20]。1949年，新疆有柯尔克孜族66145人^[21]。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为65923人。以乌恰、英吉沙、阿合奇为人数较多。

回族。又称汉回、回回、东干。民国时期，“散居于哈密、镇西、古城、孚远、阜康、迪化、昌吉、绥来、乌苏、伊犁、塔城、阿山、吐鲁番、鄯善、乌什等地，多务农，亦有经商者”^[22]。早在元代新疆就有回族居住。而回族大量迁移到新疆，是从清朝实行屯田实边开始的，户屯、兵屯、遣屯与回族移民有关。据《钦定回疆图志》所载，新疆各处屯垦士兵多从陕、甘回族聚居地调来，回族多有从军者。在户屯中，从甘肃、青海一带迁往新疆的农民中，回族也占有一定数量。在遣屯中，有内地参加反清起义被流放到新疆的回民。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河州王伏林一案中牵连到的亲属等^[23]。清代陕甘回民大起义失败后，回族从这些地方大规模西迁新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前后，苏四十三起义失败，河州、关川一带回族迁至新疆阜康一带。同治年间，跟随白彦虎西走新疆的陕西回民很多。其中以乌鲁木齐、吉木萨尔、米泉、玛纳斯、焉耆最多。清收复新疆，也曾带来大批回族士兵，其中“旌善五旗”由陕西回族组成。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河湟回民起义失败后，部分回民随刘西西迁至新疆，有数千人迁徙于今尉犁、若羌一带。清末民国时期，甘肃等地有大量回族陆续自行迁移到新疆。《新疆图志》载：“近年关内粮食回民由甘肃领票迁徙西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途。”^[24]据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经济讨论处统计，新疆回族人口为52.5万人，占全疆300万人口的15%。1928年，甘肃固原地区发生大地震，以及多年来发生在甘、宁、青地区的新

老教派之争，使大批回族人迁至新疆谋生。20世纪30年代，跟随军阀马仲英入疆的回民兵败后退入南疆和田地区驻守，因而，当时有一部分回族留在南疆。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回族人人数为99607人。以迪化市、乾德（今米泉）、伊宁等地人数为较多。

满族、锡伯、达斡尔（或称索伦）。新疆的满族、锡伯、达斡尔族是清朝实行屯垦戍边政策中移驻北疆的八旗官兵和驻防八旗官兵及眷属的后代。“居伊犁、塔城、古城或业农或游牧，民国以来，化兵为民。”^[25]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先后从黑龙江、热河等地调集八旗兵丁驻扎于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吐鲁番等地。其中，满人居住之地大多建有满城。

近代以来，作为新疆统治民族的满族由于反清农民起义、战争、民族仇杀，造成人口有所下降。1864年，在全疆性的农民起义运动中，使新疆各地的很多满族官兵及其家眷遭到杀戮。新疆建省后，新疆的满族主要集中于奇台与伊犁两地，仅有4000多人。1891年，奇台满城内发生瘟疫，死亡近千人。民国时期，因民族歧视，造成许多满族人隐瞒本民族成分，因而到建国时，人口统计仅有1000多人。

达斡尔族原在伊犁地区驻防，因沙俄侵略被迫移居到塔城地区。《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霍尔果斯河以西被沙俄割占，索伦营军民流落到俄国境内。1868年，达斡尔、锡伯等族军民回国，被安置在塔城地区。1883年，锡伯族大部分迁到新收复的伊犁霍城地区。1903年，部分锡伯族到巩留定居。1944年，据新疆警务处统计，满族人口为762人，以伊宁、奇台、绥定（今霍城的一部分）为人数较多。锡伯族人口为10624，以宁西（今察布查尔）为人数最多，其次在巩留、绥定等地。达斡尔族人口为2508人，以塔城、霍尔果斯为人数最多，其次在伊宁。

塔吉克。自古生活在葱岭——帕米尔广大地区。公元前几世纪时，分为无雷、蒲犁、西夜等国。“古代塔吉克地区曾是东西方许多民族活动过的地区，塔吉克族实际上是留居于此地的上述许多族，经过长期共同生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26]17世纪初，在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已聚居着相当数量的塔吉克人。从17世纪后期起，帕米尔高原西部什克南和瓦罕等地的一些塔吉克人，陆续东迁色勒库尔，逐渐与当地土著的塔吉克人融为一体，成为我国塔吉克族的组成部分^[27]。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塔什库尔干的一部分塔吉克人陆续迁往莎车、泽普、叶城等地。塔吉克人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为8210人，以蒲犁为最多，其次在泽普、莎车。

塔塔尔族或称鞑靼人，也有他族称之“老尔夷”，有歧视之意。民国时期散居于迪化、伊犁、塔城一带，“多以经营为业”^[28]。19世纪，随着沙俄对中亚草原的扩张，许多塔塔尔人经过西伯利亚、哈萨克大草原来到新疆北部，也有一些塔塔尔人经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南部。19世纪20-30年代，塔塔尔族陆续从喀山、斜米列契（七河地区）、斋桑等地迁入我国。近代，大批俄商进入我国境内经商，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喀山等地的塔塔尔商人。以后又有从事各种职业，如教育、宗教等职业的人迁居新疆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清末民初，到新疆经商的塔塔尔人不断增加。20世纪30-40年代统计，新疆塔塔尔族约有4600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又有不少塔塔尔族进入新疆，包括逃避兵役的人及商人。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为5610人。以塔城、伊犁为人数最多，其次在迪化市。

俄罗斯族。民国时期，俄罗斯族大多居住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有的地方形成了俄罗斯族居住的村庄。如伊宁县的托格拉克，特克斯县的卡喀达拉，新源县的阿热勒托别，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巩留县的莫乎尔，霍城县的大西沟、芦草沟，希尔津县的江莫河、冲户、海流滩，额敏县乌什水乡，塔城市的克孜别克乡和伊宁市的艾林巴克等。1944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19392人，以伊宁、塔城为人数最多。

此外，清末民国时期，在新疆境内还居住着“苏俄属之浩罕人、安集延人、阿富汗人，英属之印度人，西洋使教士等”。^[29]

在我国明清史籍中，把乌孜别克人称之为撒马尔罕人、浩罕人、安集延人或布哈拉人。乌孜别克人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吐鲁番、伊宁等地居住，主要从事商业，主要与新疆和浩罕国商业贸易活动有关。道光八年（1828 年），清政府对居住在南疆的浩罕乌孜别克人进行调查表明，喀什噶尔有 607 户，叶尔羌有 754 户，阿克苏有 473 户，和田有 229 户，乌什有 82 户，英吉沙有 77 户，库车有 25 户，合计 2247 户^{【30】}。阿古伯入侵新疆时率领许多乌孜别克人，以后沙俄灭浩罕国，又有 7000 多乌孜别克人迁至新疆。清军收复新疆后，乌孜别克人散居天山南北，主要集中在喀什、莎车、乌鲁木齐和塔城等地。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乌孜别克人数约有 8000 人。

由上可见，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口和民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因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口变动、分布状况无不影响着民族关系，原住民、难民、殖民、移民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空间分布格局。

参考书目：

- 【1】赵文林，1988，《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6 页。
- 【2】殷晴，1992，《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上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376 页。
- 【3】（瑞典）斯文·赫定著，1992，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280 页。
- 【4】【5】【6】【22】【25】【28】曾问吾，1935，《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626，625，625，642，642，642 页。
- 【7】许崇灏，1947，《新疆志略》，正中书局，第 80 页。
- 【8】【9】袁永熙主编，1991，《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6，76 页。
- 【10】【15】孙翰文，1985，“新疆民族鸟瞰”，《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新疆分册），兰州：甘肃图书馆，第 525 页。
- 【12】朱绍良，“吴忠信致蒋介石”（1944-12-6），（吴忠信）《主新日记》（1944-12-5）
- 【13】《新疆识略》卷 4
-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十年十月癸未条）
- 【16】陈志良，1934，“新疆各族之研究”，《开发西北》第 2 卷第 6 期
- 【17】“新疆省各县市局宗教人口统计表”，《新甘肃》第 1 卷第 2 期（1947）
- 【18】谢彬著，1990，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135 页。
- 【19】《柯尔克孜族简史》，1986，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92 页。
- 【20】万雪玉、曹盟，2003，“中国柯尔克孜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西北人口》2003 年第 4 期
- 【21】纪大椿，1980，《清末以来新疆地区的人口概况》，《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 年 5 月（15 期）。
- 【23】《清高宗实录》（卷 1046）
- 【24】《新疆图志》（奏议 14）《抚循回众扼防边境折》
- 【26】杨建新，2003，《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548 页。
- 【27】王钟翰，1994，《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881 页。
- 【30】（日）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983，《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446 页。

【网络信息】

致维吾尔同胞的公开信

(维汉双语)

2017-2-23 克拉玛依网

亲爱的维吾尔同胞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邪恶与罪恶像癌细胞一样正迅速而无情地吞噬我们的良知与纯洁灵魂的时刻，当极少数恐怖分子掀起的黑色风暴妄图毁灭我们几千年文明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面对“7·5”、“6·26”、“10·28”、“3·01”、“4·30”、“5·22”等一系列可怕甚至是血腥的数字时，我们怎能不愤慨，不痛恨？我们又怎能任由这一切罪恶的发生和继续，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曾经拥有辉煌而灿烂文化的民族滑向黑暗呢！我们的良知绝不允许我们沉默。我们必须站起来大声呵斥：“住手”！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祖先们驰骋草原、平定叛乱，为了国家的安宁与统一挥洒鲜血的身影；我们的驮队曾经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交融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我们的先辈们自豪地为自己取名为“维吾尔”，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团结友善、热爱和平且值得信赖的民族。千百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先民或者后代，我们都对得起维吾尔这个称号，在中华文化宝库，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中也留下了我们先民的辉煌一笔。我们一代代从古走来，为先民自豪，为我们的勤奋与智慧感到骄傲，对先进的和进步的理念与思想表现出热情和主动，从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华各民族同胞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唱响时代之歌、崇尚文明，进步的著名学者、诗人，如：一千年前伟大的思想家、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六百年前的诗神纳瓦依，二十世纪以来的阿布都卡迪尔大毛拉、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尼米希依提、鲁特甫拉·穆塔里夫等，他们给我们的人民播撒了科学文化的种子，倡导人们崇尚现代文化，接受新生事物。诗人鲁特甫拉·穆塔里夫呼唤黎明，呼唤新中国，并写下了不朽之作《中国》，用激昂的诗句激励全体维吾尔人投入拯救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尼米希依提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前往麦加朝觐，在异国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思念》，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公民意识。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反华势力所掀起的逆流。著名诗人铁衣甫江唱出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祖国，我生命的土壤》。这些先驱们以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沛的公民意识给我们竖立过榜样。

然而，不知何时，我们开始被一种畸形病毒所侵蚀，我们的民族中出现邪恶的阴影，而且越发猖狂，手段也异常残忍。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用惨绝人寰的暴力手段，残害无辜，践踏生命。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性命！这岂不是对以善为本的伊斯兰教的最大亵渎吗？如果那些灭绝人性的暴徒能进天堂，那我们还有必要选择那里，与他们同寝一处吗？

我们已经历得太多了，每一次暴力恐怖事件像一枚枚重磅炮弹炸碎了我们的心房。实际上自“7·5”以来，原本亲如一家的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们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多少失去亲人的家庭除了留下抹不去的悲痛之外，没有仇恨那是假的，这种复杂的心理难免会表露在人们渐渐冷漠而且深藏怀疑的目光里，而这种心态又会不自觉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警惕和怀疑。尽管99.99%的维吾尔同胞都是善良的，仁爱的，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然而这部分善良的人民不也成为了暴恐事件辐射下的受害者吗？

请问，在这个春天里，我们维吾尔人有谁还能感到轻松和潇洒呢？有谁又能无忧无虑、专心致志地做事呢？我们曾经的光荣和尊严，似乎正在不断地失去。我们不断感受到投向我们的目光里充满了质疑：新疆到底怎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对这样的提问，要找到答案并不难。

当然，他们是一小撮丧心病狂、失去人性的暴徒，他们并不能代表任何民族和宗教。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因此而解脱。因此，我们愿意担当，敢于面对现实。因为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维吾尔人，都已经在无形中被他们绑架，并且遭受着他们的侮辱和抹黑。实际上每一次，我们的身心、性命同样遭受了伤害，心灵一次次被撕扯，已是伤痕累累，鲜血直流。

作为维吾尔人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思考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诗人、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就该勇敢地承担。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同样负有责任。

从公职人员到知识分子，从工人农民到学生，从男人到女人，以及宗教人士。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负起这个责任。不要说，这个责任很大很重，做起来很难。其实，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都能做到；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能做好。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是的，我们每个人不妨首先从自己做起。如果你是个公职人员，请你做好一个引路者，让民众信任你，愿意跟着你永远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你要为了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惧威胁和死亡。如果你是文艺工作者，是个知识分子，那么你就要随时发出正确的声音，告诉敬重你的人们，如何生活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别人可以无语，但你一定要发声，因为你是民族的精英，许多人视你为真理的化身。如果你是个学生，那么就好好读书，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知识的力量，也只有知识能让我们摆脱愚昧和无知。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百姓，是个男人，并且是个伊斯兰教的信仰者，那么我亲爱的兄弟，请你一定要走进阳光下的清真寺，决不去藏在地下洞穴里的非法讲经点。更要远离那些来自异国的宣扬圣战暴力的书籍和音像制品。你要相信只有善待万物，才能得到真主的佑助。你不但要做到自己不相信圣战者可进天堂的鬼话，还要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都不要相信。切记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关于“民族屈辱和衰败的原因是什么？”的答复：“这是因为两点，一是，顽固与愚昧；二是，暴乱与分裂。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民族受到屈辱和衰败都源于愚昧和分歧”；以及对“如何获得尊重和力量？”的答复：“这源于知识教育和团结和睦。为此，安拉让我们紧密团结”！

如果你是女人，是我们的姐妹，请记住，正是有了你们，我们这个民族才更美丽，你要用你的美丽和智慧培养和教育你的孩子，你要用温柔和爱，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可亲可敬。还有站在讲经台上的宗教人士，你们是伊斯兰教义的传播者，责任更重大。你们绝对不能给非法讲教者留下一丁点儿生存空间，让广大教民确实实地弄清伊斯兰的教义是什么？穆斯林应该遵循什么？让他们听到阿拉真正的声音。这才是你们应做的功课，圆满功德的必须。

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在这样的时刻，作为千万维吾尔同胞备受推崇的作家、诗人、学者，我们有义务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不愿看到“维吾尔”这个内涵丰富而饱满的称呼成为暴恐的代名词，也不愿意成为愚昧和无知的牺牲品，更不愿被带进罪恶的深渊。向往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权力和责任。我们有责任引领这个民族走向更加灿烂、文明的未来。

维吾尔同胞们，我们的民族已到了危险的时刻，大象怎能成为蚂蚁的牺牲品！极少数暴徒奈何不了我们，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行动起来吧，维吾尔同胞们，用我们的智慧来铲除一切罪恶，不要给邪恶之徒留下任何筑巢的空间！团结起来吧，维吾尔同胞们，让我们与各民族同胞兄弟并肩，迎接伟大祖国美好未来，用我们的真诚来续写明天；用我们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世人的谅解和尊重；用我们的灿烂文化和面向光明未来的决心重塑我们的形象；用我们的贡献来获取曾被遗失的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有尊严！

【文件摘录】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6 年 3 月 5 日)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责任。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落实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支持政策，加强对口帮扶，**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特色村镇，加大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力度，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让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迈向全面小康社会。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7 年 3 月 5 日)

各位代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组织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支持力度，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推动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必将更加幸福安康。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